

应用经济学评论

REVIEW ON APPLIED ECONOMICS

2010年 第1辑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应用经济学评论

REVIEW ON APPLIED ECONOMICS

2010年 第1辑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应用经济学评论. 2010 年 第 1 辑 /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 7 - 5058 - 9919 - 3

I. ①应… II. ①北… III. ①经济学 - 文集
IV. ①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2382 号

责任编辑: 周秀霞

责任校对: 王凡娥

版式设计: 代小卫

技术编辑: 邱 天

应用经济学评论

2010 年 第 1 辑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宇星印刷厂印刷

永明装订厂装订

787 × 1092 16 开 13.25 印张 300000 字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9919 - 3 定价: 23.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杨德勇 李书友

执行主编 姜 竹

执行副主编 刘肖原 乔云霞 许 评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绪谨	马若微	马韬光
李书友	李宝仁	吴 强
杨德勇	郑兰平	洪 涛
姜 竹	栗书茵	徐丹丹
郭馨梅	郭 毅	

前 言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

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国际金融危机肆虐蔓延，世界经济深度衰退，我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出口大幅下降，企业经营困难，有的甚至停产倒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农民工大批返乡，经济增速陡然下滑。

2009年又是中国经济充满挑战和孕育机遇的一年。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迎难而上，顽强拼搏，从容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等措施，有效地扩大了内需，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在世界率先实现了经济回升向好，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这一年，极不平凡又令人振奋。

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为应用经济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既感慨这种机遇到来的同时，更应该自觉地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与责任。面对后危机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崛起将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格局将会发生怎样的调整 and 变化？所有这些都为从事应用经济理论研究的学者们提出了严肃的命题。2010年是我国经济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是全面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为“十二五”发展打好基础的重要一年。尽管发展环境好于去年，但是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长彼消，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中“两难”问题增多。从国际看，世界经济有望恢复性增长，国际金融市场渐趋稳定，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金融领域风险没有完全消除，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加之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等全球性问题错综复杂，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从国内看，我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巩固，市场信心增强，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企业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适时把握了这样的机遇，依托自身优势，集合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理论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具备了理论分析、调查研究优势，担负起繁荣学术、探索理论、传播知识、服务政府决策的崇高使命。在波澜壮阔的经济改革中上下求索，在丰富鲜活的实践中历经磨炼，躬身参与，当起了时代的“弄潮儿”，为有兴趣参与其中的学界同仁构筑起交流研讨的学术平台，共同探索我国社会发展、经济

崛起的新兴源泉。

《应用经济学评论》由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主办，本学术文集将应用经济理论研究与中国实践问题研究结合起来，紧扣现实主题，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立足服务中国改革需要，评论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大问题。《应用经济评论》秉承的风格是：现实升华、理论还乡，用深刻明白的理论把握时代命题、反思热点问题、回顾历史经验、展望未来趋势。

目 录

后危机时代的金融政策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关键时期的政策选择	王元龙 (1)
后金融危机时代东亚经济发展及中国的战略新选择	刘兴坤 (6)
信息经济学视角下的我国农村信贷市场低水平均衡分析	杨德勇 马晓逵 (16)
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路径选择	栗书茵 郝庆瑜 (22)
银行信息化：金融危机后的反思	张忠平 (28)
金融政策与中国经济复苏的可持续发展	李 飞 付万琳 (34)

后危机时代的财政投融资政策研究

以公共财政为导向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	赵全厚 (39)
政府投资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联性实证研究	
——兼论三次产业的政府投资效应	卢洪友 卢盛峰 陈思霞 (46)
完善制度建设 加强政府投融资平台管理	马海涛 秦 强 (57)
地方债启动之配套条件研究	杨志勇 (63)
地方财政政策对金融风险的影响	
——以广东省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政策为背景	林 江 张佐敏 (69)
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与财政风险	武彦民 (75)
地方政府投融资债务相关问题探析	李 燕 张 丽 (81)
建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缓释与防范机制	李友元 (87)
产业投资基金在地方政府融资中的作用	
——来自澳大利亚的经验	马若微 (93)
中国政府水环境保护投融资模式研究	姜 竹 (98)
城市基础设施服务的原则与供给方式优化	吴 强 (105)
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方式分析	马乃云 (112)
我国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分析及对策	史明霞 (118)
我国财政风险的体制性成因分析	杨 琼 (123)
美国水污染治理融资机制经验研究	许 评 (129)
浅谈经济复苏下中国银行业信贷结构调整与优化对策	王文卿 (135)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翟丽霞 (139)
经济复苏条件下资本市场公平与效率的思考	陈 瑶 (145)
基于后危机背景论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	杨 芷 (148)
经济复苏下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选择	赵 琴 (152)
创业板背景下中小企业融资的 SWOT 分析	郭新宇 (155)
我国政府治理水环境污染的投融资分析	程正方 (160)
地方债券在城市污水处理领域中的运用探析	葛继晨 (163)
从太湖流域水环境污染谈治污投融资	张万明 (166)
我国地方公债的风险及防范	李 楠 (170)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国外经验借鉴	何 珊 (173)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经济影响分析	贾晓璇 (176)
浅析当前地方债面临的潜在问题	李 青 (180)
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风险分析	李 洋 (184)
关于地方政府发债权的理论综述	田 欣 (188)
我国地方债发行的困境分析	吴乃枚 (192)
美日地方债券的发展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项 慧 (196)
对于我国地方政府发债时机的思考	王心博 (200)

后危机时代的金融政策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关键时期的政策选择

王元龙*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在政策选择上需要重点把握的基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坚持“两策”、保经济企稳回升。选择政策调整的合理时机，特别是选择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尤为重要。从国内外因素来看，当前绝非为调整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合适时机；二是关注和防范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如资产泡沫破灭的风险、金融机构的多重风险、国际收支失衡加剧的风险等。根据中国经济运行的现状，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微调，有利于防范和控制经济运行中的风险。政策微调重在防范风险和优化结构。三是加快改革、促经济长远发展。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只有加快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经济；“两策”；防范风险；结构调整；政策选择

2008年年底以来，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央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两策”，出台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当前，政策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已得到了扭转，经济开始企稳回升。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今年后几个月如何进一步保持企稳向好的宏观经济形势，已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上，需要重点把握的基调是：坚持“两策”、保经济企稳回升；关注和防范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加快改革、促经济长远发展。

一、坚持“两策”、保经济企稳回升

坚持“两策”、保经济企稳回升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这是因为，中

* 王元龙，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金融与国际金融。通信地址：北京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总行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18；E-mail: yuanlongw@sina.com, wyl@bank-of-china.com。

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存在着较多的不确定因素,决不能盲目乐观。

首先,从外需因素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的前景还有较大不确定性,外部需求下滑的压力依然很大,可能延续较长时间,因外需减弱使国内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矛盾凸显,对工业和经济增速回升形成较大制约。

其次,从内需因素来看,受客观条件限制特别是经济运行规律制约,中国在短期内大幅度扩大内需的难度很大。一些短期政策的效应有可能逐步递减,中长期政策见效尚需时日,经济运行还面临不少新的困难和问题。

再次,从制度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还缺乏应对危机、克服困难的内在动力和活力,国家政策支持对于企业和经济的发展还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理所当然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对此如果稍有懈怠和动摇,将可能前功尽弃、断送来之不易的经济企稳回升,中国刚刚开始的经济复苏之路必然夭折,甚至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再度陷入下滑之中。

当前国内外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究竟“两策”需要持续多久,或者说中国何时“收回”经济刺激措施?由于在中国,资本市场、资产市场、实体经济信用扩张的过程与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和收缩高度相关,尚未形成一个自动的稳定机制。因此,选择政策调整的合理时机,特别是选择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尤为重要。需要考虑的因素无非包括国内和国际两大方面:

从国内来看,时机的选择取决于实体经济是否健康运行,判断的主要标志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 8% 以上,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品价格指数由负转正,出口增长也由负转正、走向复苏。

从国际来看,全球化使得世界上每一个人更加紧密地相互依存。美国学者曾指出,如果美国打个喷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可能都会患上流感(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2005)。况且美国目前的问题远远不止打喷嚏这么简单。对于全球当前经济问题的任何分析,都必须从对美国的讨论开始。^①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联系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因此,时机的选择还应取决于美国经济是否走出衰退开始进入复苏。

显而易见,当前绝非为调整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合适时机。乐观地估计,明年上半年可能是中国退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较为合适的时机。

二、关注和防范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风险

在中国经济开始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高度关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风险因素:

首先,资产泡沫破灭的风险。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为市场注入

^① [美]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喧嚣的九十年代》,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 页。

了大量的流动性,由于短时间里投资和贷款的快速增长,带来了流动性过剩,从而资产泡沫的出现不可避免。当经济出现企稳回升迹象时,投机活动也开始活跃并不断推高股市、房市以及初级市场的价格暴涨;而资产价格的暴涨又会吸引更多的资源投向这些赚钱快的部门,又进一步加剧资产泡沫化。当经济好转之后,如果“收回”扩张性的宏观政策,现在形成的资产价格泡沫必然破灭。

其次,金融机构的多重风险。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银行业风险进一步暴露并加剧,突出表现为受市场环境变化、经济下行及净息差收窄等因素影响,信用风险严峻。而从2009年初以来,在信贷高速扩张过程中,中国的银行也新增贷款出现了行业集中、客户集中和期限中长期化的趋势,银行信贷资产的集中度风险日益凸显。特别是有些银行忽视科学决策,片面追求市场份额、规模效益,信贷管理上的内控机制存在漏洞、缺乏必要的风险约束机制等,信用风险、道德风险剧增,投资失误的潜在风险巨大。如果资产价格泡沫、楼市泡沫破灭,房地产市场很可能是下一轮银行业坏账的重灾区。

再次,国际收支失衡加剧的风险。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双顺差格局已经持续长达16年,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增加了国际收支形势的复杂性,这种国际收支失衡的格局具有不可持续性并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从当前来看,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风险有加剧的趋势。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中国外贸出口回暖将支撑贸易顺差,而且国际资本运行的轨迹方向将又会转向中国,特别是国际游资可能会再次卷土重来。2009年第二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增加了1780亿美元,其中可能有国际游资回归的因素。国际游资大量进入,对中国宏观经济、货币体系、金融市场将产生巨大冲击,加剧了国内资产价格的波动、推高通货膨胀、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

坚持“两策”、保经济企稳回升并不意味着忽视这些风险因素,恰恰是要高度关注、未雨绸缪。根据中国经济运行的现状,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微调,有利于防范和控制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其实,为防范风险,国家有关部门已经进行了一些前瞻性调整,从多个部门出台的政策来看大都具有微调的趋向。例如,央行提出要根据国内外经济走势和价格变化,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货币政策手段将注重数量调控,逐步适度加大公开市场回笼力度,并已对多家前期放贷较多的银行发行定向央票。银监会则针对国内外经济态势,采取了逆周期调节措施,多次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提示,要求采取防范措施,并出台《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督促和引领银行业金融机构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注重有效防范风险。国家发改委表示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主要包括:加快推进相关领域改革;继续完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把自主创新作为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中心环节;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把缩小城乡、地区差距作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着力点。显而易见,政策微调重在防范风险和优化结构,为此当前需要注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财政政策的适当调整。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公共投资、税制改革等手段直接和间接地扩大了社会需求。显然,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财

政政策在调整经济结构、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当前,在继续坚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更需注重对财政政策的适当调整。对财政收入结构的调整方面,重点对新能源、信息技术等行业和一些服务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对财政支出的结构进行调整,要将重点从政府投资转向政府对消费的支持,主要增加社保、教育、医疗和公务员工资等的支出。税收政策调整的重点是向消费倾斜,可考虑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积极主动把握当前的有利时机推进资源税改革,现行不合理的资源税导致资源极大地浪费、也使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矛盾突出,资源税改革有助于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结构升级、提高增长质量;可考虑增收不动产税、房屋地产短期交易个人所得税。

其次,货币政策的微调。今年后几个月仍要继续坚持适度宽松的既定方针,但在实施过程中可适度进行微调,由“过度宽松”重归“适度宽松”,以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着重调整信贷结构,提高信贷质量和效益,加强对农业、中小企业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努力增强信贷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持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与此同时,货币政策也应当在防范资产价格泡沫风险以及金融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就调整信贷结构而言,微调的重点在于向两个方面倾斜:要求并确保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向实体经济倾斜;引导和鼓励商业银行对信贷投放进行结构性调整,在保持基础设施建设的配套贷款合理增长的同时,信贷投放向有效推动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倾斜。

再次,加强监管和防范风险。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对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对“保增长”至关重要。从商业银行来看,当前要特别防范项目资本金不实或不足风险、票据融资风险、贷款集中度风险和房地产市场风险等新的风险点。为防范不良资产风险,应进一步从内外两方面强化风险管理,要加强来自监管部门的外部风险监管以及银行自身的风险监管。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要进一步加强加强对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力度,并采取得当的措施,争取在泡沫膨胀的过程中通过持续、稳定和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断拓宽和深化资本市场、规范房地产市场,以及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开放来逐步化解或舒缓泡沫。为防止大规模的国际游资流动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加强和改进对国际游资的监管已成为当前外汇管理工作的重点,要完善资本流动风险的监控体系,构筑狙击国际游资冲击的“防火墙”。

三、加快改革、促经济长远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运行之所以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既有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外部因素,也有中国内部经济结构不合理、转变发展方式滞后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深层次原因。这场金融危机将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充分暴露无遗。因此,在坚持“两策”、保经济企稳回升的过程中,中国还必须加快改革,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重要方向、把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与防范风险、调整结构结合起来,以实现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体现在很多方面,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例如,从保增长来

看,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出口、投资、消费结构严重失衡,以高投资和高出口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未来健康的“三驾马车”次序结构必然为“消费、投资、出口”。从扩内需来看,存在着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尽管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投资见效快于消费,而最终经济增长依赖于消费的推动。从内外关系来看,外需依赖度高与内需拉动不足失衡;从投资的内部结构来看,投资中的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存在着结构性失衡,等等。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内外部经济不平衡交织在一起,中国国际收支长期双顺差、国际收支失衡格局已持续十多年,蕴藏着巨大的风险。毫无疑问,只有加快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題。

需要指出的是,导致中国经济以及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结构性失衡。从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来看,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① 基于对中国金融体系基本状况的这种判断,可将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归纳为九大方面:一是金融地域结构性失衡,城乡金融发展不协调所形成的失衡。二是金融组织规模结构性失衡,中国金融体系缺少社区银行一类的微小金融机构,各类银行都想做大。三是融资方式结构性失衡,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发展不协调所形成的失衡。四是资本市场内在结构性失衡,如交易场所结构单调、单一的证券交易所市场结构;不同金融工具的融资规模结构失衡,表现为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滞后。五是金融业内结构性失衡,长期将金融业发展的重点放在银行业上,金融业其他行业如信托业、金融租赁业的发展则严重滞后。六是金融综合经营趋势与金融监管体制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失衡。七是金融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金融资源过度向大型企业、房地产企业集中,中小企业融资难。八是商业银行业务结构性失衡,即商业银行期限错配、货币错配所形成的银行业务结构性失衡。九是金融开放结构性失衡,表现为金融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不协调。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如此严重结构性失衡,已经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的走向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金融体系结构的调整刻不容缓。

当前,中国正在努力通过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此同时,需要更加注重通过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增强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缓解当前面临的困难、最终战胜金融危机,关键在于改革。金融危机对中国带来的最大机遇,就是推进改革,实现结构调整,这是中国从“经济金融大国”走向“经济金融强国”的必由之路。

从中国金融业来看,必须增强紧迫感,以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为指导,加快改革步伐,把优化结构作为金融发展的重心,采取积极、务实的措施,推进制度创新,促进金融结构的合理化,为保经济企稳回升、促经济长远发展发挥金融的支持作用。

^① 参见《银行家》2006年第3期。

后金融危机时代东亚经济发展及中国的战略新选择

刘兴坤*

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迅速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并导致世界经济下滑。随之，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对呼声不断，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一种集国家调控和经济自由化于一体的折中组织形式受到青睐。但是，欧盟一体化程度最高，也没有避免经济衰退，甚至要严重于美国。与之相反，东亚地区虽然没有实现制度层面的一体化，但是凭借国际生产·流通网络实现了整体上的稳定增长，再度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新增长极”。本文主要探讨东亚地区成长为“新增长极”的根本原因，并指出中国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新经济增长极”；国际生产·流通网络；二维分散性区位选择；产业集群

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海啸贯穿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从美国本土蔓延至全球，由金融领域扩散至实体经济，由发达国家延伸到新兴市场国家，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经济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由此世界经济步入下滑周期。保持了 30 多年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东亚再度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增长极”，形成抗衡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力量。随之，关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讨论再次掀起高潮。东亚地区作为世界经济三大板块之一，区域一体化程度落后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但是为什么后金融危机时代，是东亚而并非欧盟或者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增长极”呢？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将何去何从呢？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增长极”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世界经济（或一国经济）波动会通过传导机制^①，即货物流动、生产流动、货币流动、人员和信息流动等传递到其他国家。此次金融危机同样经过传导机制影响到各国经济及国际经贸关系，既而进一步影响世界各国实体经济。这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区域主义，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凭借其稳定性能够有效地抵御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外部冲击。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作为区域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②仍然不是完美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有效地避免负面的外部性冲击。相反，受金融危机影响，欧洲本已不景气的实体经

* 刘兴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品内贸易、东亚经济。联系方式：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邮编：100872；电子信箱：guodong07@163.com。

① 世界经济的传导机制是指，一国经济发生的经济现象，诸如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等对其他国家经济产生影响的规律性。

② 金融危机源于北美地区，在此不对其进行讨论。

济更是“雪上加霜”。根据欧洲统计局的数字,欧元区从2008年第二季度相比同期开始出现负增长,并进一步导致信贷紧缩,抑制企业生产和个人消费,全球经济放缓也必然打击欧盟出口,欧洲经济举步维艰。

由于国家利益冲突,政治、历史遗留问题难于解决,东亚短期内难以形成像欧盟那样高层次的一体化。但是,实体经济层面,国际生产·流通网络的形成推动了经济一体化的实质性进展,并推动东亚成长为“全球经济新增长极”。与欧盟及北美相比,东亚经济一体化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逻辑运转的。当世界经济处于上升时期时,个体与整体的利益基本一致,此时存在纯粹的经济学,经济增长只受制于稀缺资源,个体都关注绝对利益,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当经济增长源变异时,则不存在纯粹的经济学,各国会更更多地关注自身的政治利益(如收入分配等)。备受金融危机影响,欧盟经济陷于衰退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欧盟层面上缺乏整体协调,由于利益不同,各国都把本国利益置于欧盟整体利益之上,使其难以形成合作以共同应对危机,因此欧盟经济较之美国这个危机的始作俑者更早地进入衰退期。据欧盟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欧元区15国和欧盟27国经济今年就将进入衰退期,而且要到2010年才会开始复苏。

东亚地区经济实现长期高速持续增长,全球经济步入下滑期之际仍然作为世界经济的“新增长极”,关键在于其存在“纯粹的经济学”,各成员国的绝对利益是永恒的,个体与整体在绝对利益方面是一致的,因此即使东亚没有形成欧盟那样高度的政治组织一体化,但是实体经济层面的一体化足以使东亚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导力量。2008年,美国金融动荡并导致全球经济放缓,东亚国家的经济受到全球经济的影响,增长会有所下降,但整体增长将保持健康态势,大多数国家能够安然度过此轮全球经济放缓。接下来,本文将详细分析东亚地区国际生产·流通网络的运行机制,探讨东亚经济抵御外部冲击并且总体上保持健康态势的根本原因。

二、东亚地区国际生产·流通网络的形成与性质

东亚成长为“全球经济新增长极”的实质在于域内国际生产·流通(Production/Distribution)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此网络是由域内诸国的垂直生产链和世界范围的流通网络组成的,其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东亚生产区位和国际贸易格局。但是,与美国-墨西哥纽带(US-Mexico nexus)和西欧-中东欧走廊(WE-CEE corridor)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东亚生产·流通网络具有其独特性和发达性。木村福成(Fukunari Kimura, 2006)通过对贸易、跨国公司微观数据分析以及案例研究和随机性考察(Casual Observations),对东亚生产·流通网络的18大特征进行了分析。总之,东亚国际生产·流通网络的独特性和发达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重要性,即其已成为东亚诸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讨论诸国的制造业生产活动和国际贸易不能忽视这一网络;第二,广域性,即其覆盖了大量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形成垂直生产链,能够有效地利用诸国间生产要素价格差异及其他区位优势;第三,复杂性,即既包括企业内(Intra-firm)贸易也包括企业间(Arm's Length)

贸易, 部分贸易发生在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 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

现在通过 Maquila^① Operation 分散性区位选择的简单模式和日本跨国公司典型的东亚模式之间的比较来进一步说明东亚生产·流通网络的独特性和发达性。图 1 描绘了美国跨国公司典型的 Maquila Operation 模式。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跨国生产主要是简单的企业内分散性区位选择模式, 即由美国总公司向墨西哥分公司提供零部件, 并将组装完成的最终产品运回美国总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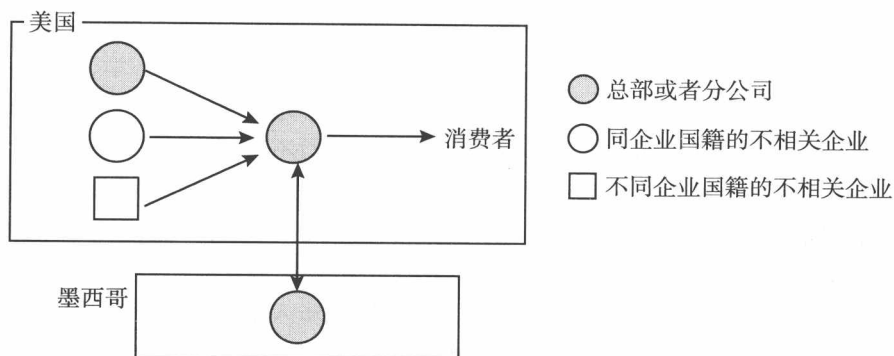


图 1 美国跨国公司典型的 Maquila Operation

资料来源: Mitsuyo Ando and Fukunari Kimura. Fragmentation in East Asia: Further Evidence. KUMQRP (Keio University Market Quality Research Project)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DP2006 - 23, 2008. Keio University Japan.

与 Maquila Operation 模式相比, 东亚生产·流通网络涵盖了大量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同时企业内和企业间贸易相结合使其呈现出更大的复杂性。图 2 参照日本电子机械产业制造商的例子描绘了东亚地区的国际生产·流通网络, 解释了东亚“全球经济新增长极”的形成基础, 也证实了东亚国际生产·流通网络的强大生命力。

三、东亚地区国际生产·流通网络形成的基础

从东亚经济发展的整体来看, 资本集约型产品的生产过程并非都集中于先进国, 而倾向于被分割成精细的生产工序并进行域内国际性分散化, 这与传统贸易理论是相违背的。在此基础上, 东亚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分工网络。新型的国际分工意味着新型的生产区位选择模式和贸易结构的出现, 分散性区位选择理论为此国际分工格局提供了理论基础。随着国际经济发展和国际分工深化, 分散性区位选择理论的适用性已经远远超过其最初概念, 同时东亚国际生产·流通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为此理论赋

^① Maquiladora 是位于墨西哥境内、属于美国公司的一种工厂（专门使用从外国免税输入的部分产品或零件来装配为成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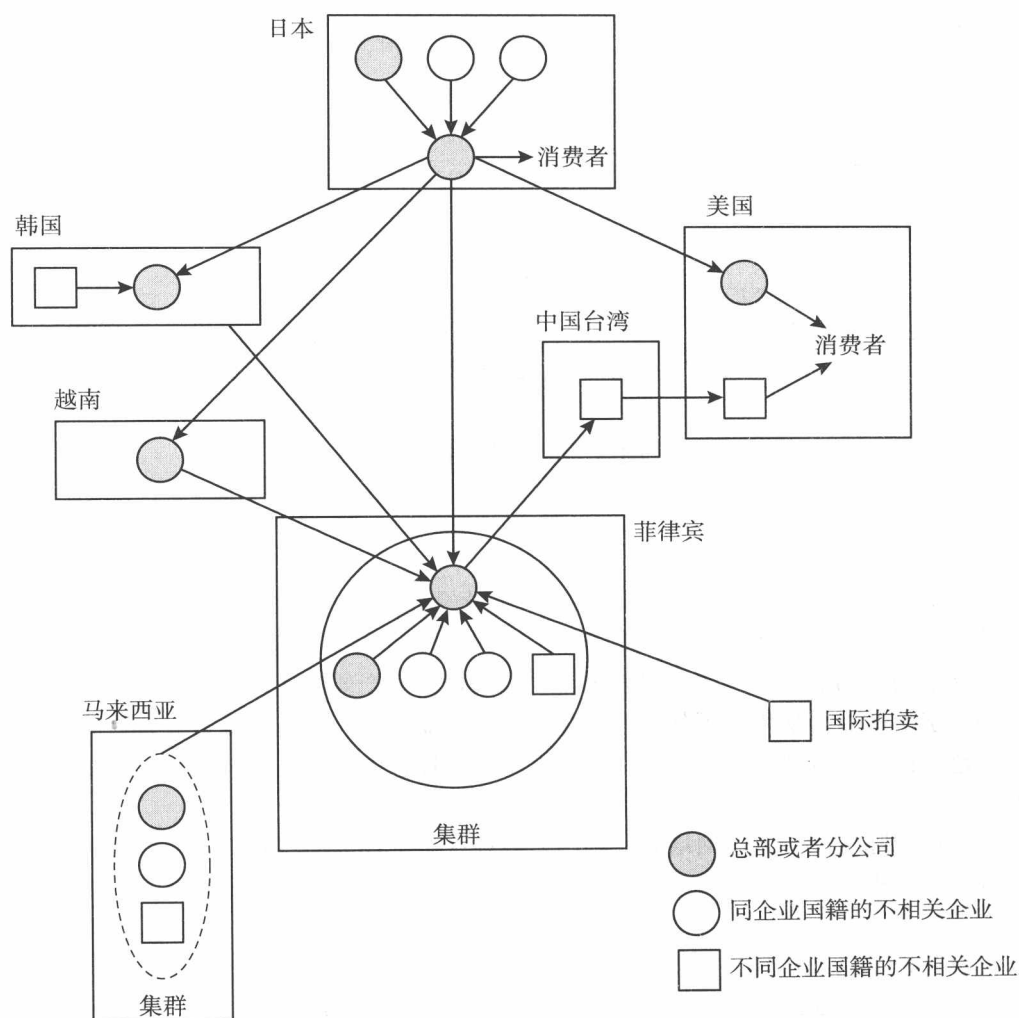


图2 日本跨国公司典型的东亚模式

资料来源：Mitsuyo Ando and Fukunari Kimura. Fragmentation in East Asia: Further Evidence. KUMQRP (Keio University Market Quality Research Project)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DP2006 - 23, 2008. Keio University Japan.

予新的内涵。

分散性区位选择最早源于美国 - 墨西哥之间的生产分工，指原来在某一地区集中进行的生产活动被分解为多个生产区位（Production Blocks），根据最优区位选择原则将异质性生产活动分散到世界各地。

根据传统理论，如果某产业整体上属于资本集约型，如图3上半部分，生产过程从上游到下游作为整体集中于先进国家，并形成大工场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以半导体为中心的电子机械产业为例，其某些生产工序属于技术集约型，其他工序可能是典型的劳动集约型。那么按照生产工序的技术特征，一部分可以留在先进国，其他部分